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

卞孝萱 胡阿祥 主编



绝唱 悲凉

关于晚清改革的历史沉思

南京大学出版社

李立锋 著

卞孝萱 胡阿祥 主编

李立锋 著

中国改革
史鉴丛书

绝唱

悲凉

关于晚清改革的历史沉思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悲凉绝唱：关于晚清改革的历史沉思 / 李立峰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
(中国改革史鉴：6 / 卞孝萱，胡阿祥主编)
ISBN 7-305-03319-7

I. 悲... II. 李... III. 政治改革-研究-中国-清
后期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156 号

丛 书 名 中国改革史鉴
书 名 悲凉绝唱——关于晚清改革的历史沉思
著 者 李立峰
责任编辑 黄继东
装帧设计 杨小民
责任校对 汪 明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 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字数 190 千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本册定价 12.00 元 (总六册 定价:72.00 元)
ISBN 7-305-03319-7 / K·234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596923、3593695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

总序

2010965

卞孝萱 胡阿祥

—

改革大潮正以磅礴之势席卷中华大地。

发端于1978年的当代中国改革，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辉煌历程。

改革需要理论的指导，改革需要实践的开拓，改革同样需要历史的借鉴。

悠久的历史，留给我们丰富的改革遗产。在当代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刻的今天，系统研究中国改革史，从中汲取改革的精神力量，并廓清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改革的背景、改革的举措、改革的得失等等，这对更好地把握现在，推进现实改革更稳健、更迅捷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贞观政要·任贤》记载唐朝著名政治家李世民的话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本书取名“改革史鉴”，其意正在于此。

二

《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不处于不停的变化、运动之中。大至天体，小至原子，变是绝对的，不

变是相对的。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中。当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时,当过时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时,改革就必然会出现。

战国时期大改革家商鞅云:“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吕氏春秋》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隋文帝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龚自珍则以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变易。”这些论述都深刻地阐明了改革的必然性。

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有史籍记载的大中型改革有几十起之多,小改革更是不计其数。中国社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中,不断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人们常说: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革之势不可逆转。这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深刻洞察基础之上的断语,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三

我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变法”、“革新”、“改制”、“新政”云云,大体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挽救危机、维护统治之举,重在体制和政策的厘正和变通;它往往发生在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政治、经济危机已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危急时刻。作为通常人们公认的改革,这当然是改革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不独仅此,在规模、气势、影响等方面更大的一类改革,是改朝换代之后的开国时代之重新制章立典。这样的制章立典,形式上是针对前朝之弊而多所兴革,目的上是求得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对于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这类改革常常具有重大的阶段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同样是出于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目的,然而措置失当乃至与客观规律根本悖背者,如王莽的托古改制,我们也纳入了改革的范畴加以论述,并且认为,这样的“改革”也不能忽视。然则以上述

的认识来通观中国历史,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中国历史的演进,正与不断的改革相伴而行;内容繁富、各具特色的改革,正是中国历史这本厚书中最引人入胜、最予人启迪的篇章之一。

四

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改革史,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改革的横断面(分时期或断代)研究;改革的纵向分类研究;改革家研究。

就横断面研究而言,因为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产物,所以改革的发展进程与社会发展阶段是相一致的;在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改革,其性质都是封建化改革,在改革中完成了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大转化;晚清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改革活跃期,改革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而其核心内容则是企图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这同样是伟大的变革。改革又是统治阶级自我完善、强化统治的手段,以此,改革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盛和败落;不同王朝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民族形势、政治状况、经济条件、文化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了改革的内容与取向。比如秦、西汉的改革,以建立、健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为核心;十六国北朝以胡族入主中原,汉化、封建化改革就是无可选择的主题。封建社会前期的唐朝与封建社会转向后期的宋朝,改革也表现出不同的面貌:隋、唐前后相继的不断改革,促成了大唐盛世的到来,宋初强干弱枝、分化事权的改革,却导致了两宋冗兵、冗官、冗费的恶果;又契丹、女真、蒙古所建立的辽、金、元王朝,在祖述与变通之间,备尝许多体制尴尬并存所带来的无奈;到了明、清,改革造成了极端的君主专制,改革也最后一次迎来了大清盛世,然而中央集权封建体制走向衰朽,封建社会的没落以至崩溃,却非改革所能挽回。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转化,不同的王朝及其更替,改革有着规模、内容、性质上的不同;以此,中国改革史分时期或断代的研究,可以全面展现改革的背景、改革的面貌及改革的功效,事实上,这也是治中国改革史的传统做法。但改革史研究的另一种方法即纵向分类研究,其实也很值得尝试。例言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由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而宋太祖、明太祖,随着不断的改革而日益加强;地方行政制度,自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来,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症结,政区层次变化不定,划界原则反反复复,机构设置屡次调整,却始终寻找不到最佳的方案;又选官制度方面,由奴隶制时代无所谓“选官”的世卿世禄,到封建社会的养士军功、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科举考选,真可谓不断兴革;再如赋税制度,也有着丰富的改革内容:赋税形式从劳役税发展到实物税再发展到货币税,赋税摊派从以人户为单位转变到以财产为标准,赋税征收由人口税、土地税、劳役等项单独分征演化为合而归一,无不与重大的改革活动相联系。其他诸如中国历代治国思想的嬗变,中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改革,中国历代民族政策与民族治理机构的变化,乃至中国历代改革思想与理论及反改革思想与理论等等,也都是中国改革史研究的上好选题;而且这样的研究,既富学术意义——与改革史的横断面研究互为补充与完善,从而有利于对改革史的深层次把握,也极具现实价值——其间所体现的改革的艰难、反复与伟大,所揭示的改革的规律,所显出的改革的经验与改革的教训,都值得今人深深地反思。

当然,除了以上一横一纵的改革史研究之外,改革家也可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一部改革史,是与许许多多改革家的个人活动紧密关联的;虽然改革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改革的根本目的也都是为了巩固其阶级统治,但只要改革家的举措代表了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这正如范文澜先生在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被统治阶级爱祖国也爱及国家和君主，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爱国家和君主也爱及祖国，只要归根是有利于祖国和人民，他们的行动都值得尊崇”；那些“改善政治”、“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的统治阶级人物，“依据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实际贡献，都可以称为爱国者”——改革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正是这种特定意义上的爱国者；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鼓舞、驱使着古代、近代的改革家们勇于奉献、不惜牺牲。然则如此说来，为改革家立传，为改革群体画像，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五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属改革的横断面研究。我们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具有代表或典型意义的时期或朝代的改革，探讨改革的背景、措施、政策，改革中的斗争，改革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我们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协调统一，不故作高深，而力求深入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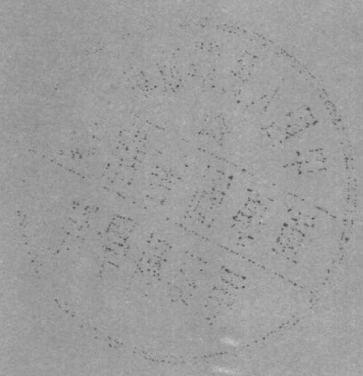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史研究不可能为当代改革提供现成的模式；当代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另一个亟待全面研究的宏大课题。改革史服务于现实的主要方面，还在于启迪思路；丰富的改革经验，深刻的改革教训，不畏艰险的改革勇气，都可供当今改革家提炼观点，概括规律。至于读者，在阅读我们这部奉献于伟大时代的不成熟的《中国改革史鉴丛书》时，则关键是要汲取古代改革的精神，明了唯有改革才有出路的事实，进而理解改革，参与改革。

是为序。

1999年6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



目 录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总序

- 第一章 启蒙晨曦**…………… (1)
- 一、睁眼看世界——知夷…………… (1)
-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 (6)
- 三、真的是夷吗——对“夷夏大防”的最初冲击…………… (12)
- 第二章 洋务风起**…………… (20)
- 一、自强求富——近代工业从这里起步…………… (21)
- 二、求知求学——近代文化教育的发端…………… (48)
- 三、“夷夏大防”与“中体西用”
——洋务悲剧的两大成因…………… (64)
- 第三章 维新潮涌**…………… (94)
- 一、君主立宪——维新的目标模式选择…………… (95)
- 二、百日新政——维新的最强音…………… (111)
- 三、“政争”、“党争”与“激进主义”
——维新喋血的三大根源…………… (136)

目 录

第四章 最后的梦	(157)
一、条约与战争——梦的由来	(157)
二、真正的新政	(161)
三、梦的幻灭	(188)
第五章 历史的沉思	(201)
一、时机——成败的杠杆	(202)
二、“党争”——祸害无穷的一条线	(209)
三、关于泛道德主义文化传统和改革者的素质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26)
后 记	(229)

第一章 启蒙晨曦

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

——林则徐

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冯桂芬

一、睁眼看世界——知夷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空前的战争惨败，使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和尽善尽美的幻想破灭了；西方文明的浪潮首先以其站在潮头的“坚船利炮”使与世隔绝的大清帝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冲击。这种冲击是如此之猛烈，以至于那些首先从炮火的轰鸣中醒来的比较敏感的人们，再也无法重新沉迷于天朝大国、唯我至尊的美梦中了，他们不能不思考：为什么泱泱天朝竟会被自己一向所不齿的“夷狄”打得一败涂地？他们不能不思考：我们今后又该如何去应付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的“夷狄”？这时，他们才发现，虽然他们已经预感到今日的英夷，决非昔日的突厥、匈奴可比，可是天朝的芸芸众生，竟然对这些“夷狄”来自何方、“夷情”如何，一无所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这句话他们是知道的。于是,这些最早醒来的人们,开始睁开迷蒙的睡眼打量这令人困惑而又非常陌生的世界,迈开了他们“知夷”的第一步,也是近代中国启蒙的第一步。

无疑,最先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当是林则徐。其实,当林则徐初任两广总督时,和当时清政府官员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并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自以为天朝是世界的中心,狂妄地认定:“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①甚至愚昧地判断“夷兵”“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②可是,林则徐的伟大及过人之处首先就在于他不是一个大自狂,而是一个能审时度势的政治家,一个具有实事求是精神的现实主义者。在广州和外国列强的接触和交手,使林则徐很快改变了自己的糊涂认识,清醒地得出了“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③的结论。于是,他放下当时一般的清朝大员们不可能放下的封疆大吏的架子,亲自向各国商人、传教士甚至船员了解“夷情”,了解“天朝”之外的世界,他还组织人员侦探夷事,网罗人才翻译外国的书籍报刊。在了解、研究西方世界的基础上,林则徐编译出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四洲志》的出现,意味着中国人终于迈过了中世纪的门槛,跨出了《山海经》的苑囿,以实事求是的平等姿态,睁眼向洋向全球了。这本书也成了中国触及近代世界第一部比较系统而又确切的译作。书中首次介绍了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纠正了许多前人的偏见和谬误。书中还首次向国人介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不仅介绍了美国的总统制,还详细描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及西方各国的议会制等。可以想象,对当时尚处于蒙昧状态的绝大多数满清士大夫来说,《四洲志》无异于一

① 《林则徐集·公牍》,第58页。

② 《林则徐奏稿》(中),第676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体察洋面堵截情形折》,第98页。

颗重磅炸弹，“中土居大地之中”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了。难怪后来的维新领袖梁启超推崇《四洲志》是“新地志之嚆矢”。

和林则徐一样，魏源、徐继畲、姚莹等也敏锐地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步步进逼，将成为日后中国的主要祸患，为了寻求“制夷”、“筹远”的良策，首先就需要了解敌人。“悉夷情”成了他们的首要目标。

魏源是拥有当时第一流西方知识的大学者，林则徐的朋友。鸦片战争爆发时，他被林则徐推荐到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参预筹划浙江前线的抗英斗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清廷上下依然的狂妄自大，使悲愤的魏源更加痛感到要改变这种可悲局面，当务之急必须要使朝廷上下了解夷情，认清敌我力量的对比。于是，他接受林则徐的委托，呕心沥血，终于在《南京条约》签订的三个月后——1842年12月，完成了近60万字的《海国图志》50卷本，继而在1846~1847年增补为60卷，1852年再刊于江苏高邮，扩编成88万字的百卷本。《海国图志》所参考和征引的文献资料，除了林则徐的《四洲志》外，还引用了许多明代以来岛志中的相关材料。更可贵的是：魏源在介绍西方各国情况时，着重采用外国人著作中的材料，“以西洋人谭西洋”^①。他甚至直接询问英军俘虏，中英开战不久，宁波捕获一名英军炮兵上尉，魏源闻讯后，立即从扬州赶往宁波，亲自从俘虏那里了解英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知识，据此写成《英吉利小记》一书，随后辑入《海国图志》。魏源收集的资料数量如此之多，范围如此之广，使《海国图志》成为当时国内最详备的世界史地著作。仅地图《海国图志》中就有77幅，包括世界全图、各洲图、各国图及沿革图等。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地图不免图形粗糙，而且存在一些偏差，可在150年前的中国，那确是前无古人的开山之作。

① 魏源：《海国图志叙》。

继魏源之后,徐继畲于1844年写成了介绍世界各地政情与历史、地理的《瀛环考略》一书,1848年增订为《瀛环志略》。徐继畲曾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太仆寺少卿等职,在鸦片战争期间与外国人接触较多。交流与接触使徐继畲深深感到无知与愚昧充斥朝野,这必将给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的未来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于是,这个“早醒的人”便以其责任感开始热心留意西事,以期唤醒那些“尚在酣睡的人们”。他利用工作之便主动去接触了解西方人,特别注重收集外文资料与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书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得片纸亦存录勿弃”^①。从而掌握了丰富的世界史地知识。《瀛环志略》一书,考订严谨,以图为纲,而且地图的质量比《海国图志》有了提高。更重要的是,《瀛环志略》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了西方各国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诉讼制度,并且鲜明地认为近代化的教育、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是西方强盛的主要原因;书中还介绍了欧洲近代化的军队、军备与近代化的军事训练,同时书中还用大量事实揭示了西方列强争霸世界、争夺世界市场、掠夺和压榨弱小民族的本性。这本书的意图也是明明白白,可谓苦心孤诣,唯求朝野国人之警醒。

姚莹也是一位杰出的启蒙学者、有着超前眼光的思想者。早在嘉庆年间就开始以世界眼光来了解西方,“购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无人留心海外”^③是导致中国夜郎自大最后战败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更加急迫地探索外部世界,大力搜集世界史地知识材料,多方进行调查研究的,于1845年写成了《康辅纪行》16卷,旨在使中国了解英、法、俄、印等国与西藏边疆的形势。他对英、法历史,英、俄、印

① 徐继畲:《瀛环志略·自序》。

②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复光律原书》。

③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复光律原书》。

各国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以及喇嘛教、天主教、回教源流等问题,都有较详的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对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可能染指西藏提出了警告。在这一点上,历史已经证明了姚莹预见的准确性。“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①这是一个思想者的远见卓识;“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海边之防,免胥沦于鬼域”,^②这是一位爱国志士的壮烈情怀。

《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康輶纪行》等著作的问世,为长期闭塞的国人推开了一扇眺望外部世界的窗口,为窒息已久的社会透入了一股清新空气。它们描述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不了解的外部世界的面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为近代中国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新知识、新观念,促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念的产生和形成,从而带来了社会风气的逐渐变化和更新。同时,这些启蒙思想家们对世界大势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全球性殖民扩张看得很清楚——“天下从此多事”,他们对中国面临的威胁表达了严重的忧虑。在这些启蒙者的内心深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责任感、使命感与他们超前的思想和敏锐的洞察力相结合,不能不使他们去清楚地表达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危机感。人们也开始从他们那儿逐渐认识到:中国的位置并不在世界的中心,再也不能夜郎自大、一厢情愿地把自己的国家看成是“天朝上国”;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员,地球上还有五大洲、四大洋,还有许多与中国一样的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大小不等,强弱各异,却有着各自固有的治理疆域、历史沿革和社会生活。这些在不久之前还匪夷所思的认识又开始启迪着人们逐渐走出“万方来朝”的迷梦,走出传统的封闭圈子,对外部世界由消极、被动接受转向积极、主动探寻,

①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复光律原书》。

②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八,《复光律原书》。

从而开创了一种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社会新风尚。虽然这种新风尚在这时还不成气候,但正如东方露出一丝晨曦一样,看到光亮的人们是不会再回到黑暗中去了。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

“知夷”的口号使大幕后的中国有了一丝缝隙,文明的曙光开始顺着这一丝缝隙透入,先行的人们领略到了近代文明的风采。可是,欣赏美丽的风景不是他们鼓吹“知夷”、拉开大幕的目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贤教诲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不允许他们这么做。无论林则徐、魏源,还是徐继畲、姚莹,都是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隆隆炮声中走出认识世界的第一步的,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在以“坚船利炮”为外部特征的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仓促上阵去认识西方文明的。很明显,这是一种被动回应。既然是被动的,那么这种认识与回应就必然首先体现出一种功利主义色彩与现实主义要求。因此,他们绝不可能把“知夷”、把西方文明仅仅当作一种纯粹知识、当作一种书斋里的学问去认识、去研究。当他们敏锐地预见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将不可避免地给古老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的严峻局势时,了解西方、认识世界不会成为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知夷”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适应中国现实的迫切需要,以“知夷”为手段、为起点,从中学习西方文明,让中国走向世界,从而寻求文明古国的自强之路。这一点,在林则徐、魏源的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更加完整,也更加具有全局性。

“知己知彼”是孙子的千古教诲。可是,在1840年代的中国,能够真正懂得这四个字的人又有几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够正确认识自己不容易,能够正确识别的国家和民族也不容易,反省自己落后于别国更不容易,更何况要一个一向以“天朝上国”、“世